

XZGWJOL
新中国外交亲历

◆ 徐明远 著

一任三使 风雨疾

新华出版社

XZGWJOL
新中国外交亲历

◆ 徐明远 著

一任三使 风雨疾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任三使风雨疾/徐明远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5011-8848-2

I. 一… II. 徐… III. ①徐明远—生平事迹②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大洋洲—现代 IV. K827=7 D8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2790 号

一任三使风雨疾

作 者: 徐明远

责任编辑: 韩 芳

封面设计: 冯 锴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8848-2

定 价: 28.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 89580863

新中国外交亲历丛书

主 编 张 兵

顾 问 王 殊（外交部前副部长、外交笔会会长）
吴红波（外交部部长助理）
闵永年（外交部离退休干部局局长）
黄桂芳（外交笔会副会长，前驻菲律宾、新西兰、津巴布韦大使）

名誉顾问（以下均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前驻英国大使）
李肇星（前外交部部长）
金永健（前联合国副秘书长）
吴建民（外交学院前院长、前驻法国大使）
杨振亚（前驻日本大使）
陈 健（前联合国副秘书长）
张毅君（前驻加拿大大使）
梅兆荣（前驻德国大使）
蔡方柏（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会长、前驻法国大使）

编 委 万经章 刘一斌 吴德广 汤铭新 张 兵

特邀编委 尹承德 白 颖 刘新生 李家忠 朱祥忠 陈久长 陆苗耕
黄舍骄 蒋本良 潘正秀 戴 严



总 序

王 殊 外交部前副部长、外交笔会会长

本套书是已离退下来的我国驻外大使和其他外交官回忆过去在外交场合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的真情实录。相信读者通过这些故事能够了解一些我国外交官在国外的工作和生活。

由于外交工作的特殊性和机密性，长期以来有关外交工作和外交官工作、生活的回忆文章发表很少，众多读者对外交工作缺乏了解，甚至感到很神秘。我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与合作关系，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当然，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民族利益，反对强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工作中有时斗争激烈，气氛紧张，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也有时矛盾很多，问题复杂，协商困难，僵局难解。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而更多的另一个方面是，发展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推动各方面的往来和交流，增进相互的了解和友谊，加强平等互利的合作。在意见不同或有分歧时，要互通情况，平等协商，通情达理，消除分歧；而在利害有不一致时，也要耐心谈判，弄清是非，互谅互让，实现共赢。所以，我们驻外外交官的主要工作是寻求合作，加强来往，发展合作，增进友谊。为此，在工作中就要加强调查研究，注意观察局势变化。

近些年来，我们外交官撰写的有关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回忆文章逐渐多了起来，对读者了解外交工作的情况有不少帮助，但仍然数量太少，而且不够系统和全面，有分量的作品不多。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有关外交工作的小说、戏剧、报告文学等，除了一些纪录片外，也没有一部电视、电影。鉴于此，这些年来离退的外交官逐年增加，很多富有工作经验并且对写作有兴趣的同志组成了外交部离退休干部笔会，借以推动和鼓励回忆文章的写作和发表，以使读者更多地了解外交工作和外交官工作、生活的情况。这些文章



发表和出版以后，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使作者得到了很大的鼓励。当然，这个工作还只是一个开始，还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并且希望得到出版界和读者的大力支持帮助。

由于篇幅有限，本套书只是挑选了近年来笔会同仁撰写的各方面回忆文章中极少的一部分。作者本人曾经历过不少外交的大场面，身边也发生过许多亲身经历难以忘怀的故事。有些是他们在同国外领导人交谈和接触时的深切感受，有些是同当地各界人士和人民交往中的真诚友情；有些是他们在外交折冲中的所想所感，有些是他们在外交场合中的所见所闻，也有些是在访问旅途中看到的秀丽山川、民风习俗。挑选的范围力求广泛，角度也有不同，主要是想从各个方面向读者介绍一些我们外交官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从而增进对我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外交工作的了解。至于这个想法能否实现，有待读者的批评指教，以便今后在工作中作进一步的改进。



目 录

总 序 / 王 殊 1

序 章 走上外交之路 / 1

第一章 临危受命使三国

临危受命 / 15

迎头骤雨 / 17

初会总理提交涉 / 22

不打不相识 / 25

大洋浊浪又排空 / 28

陪同马拉总理访华 / 31

同加尼劳总统的交往 / 35

和政变领袖兰布卡交朋友 / 39

斐济国粹飨嘉宾 / 43

出席前总督萨空鲍葬礼 / 47

炎黄子孙和侨领们 / 51

出席侨团活动 / 62

同人好友们 / 67

外交团 / 76

难忘人民兄弟情 / 81

第二章 五星红旗在太平洋中心飘扬

向塔巴伊总统递交国书 / 93

平民总统 / 97



“中华民国”旗帜惊现首都塔拉瓦／101

李登辉的“特使”悄然抵基／104

五星红旗在太平洋中心飘扬／107

中国基里巴斯建交十周年庆典／110

访副总统家乡／113

两名中国医生稳定了基国政局／115

自行车传友情／118

天涯芳草／121

太平洋惊魂曲／124

第三章 艰难的使命

瓦努阿图：“赖以生存的土地”／131

中瓦友好交往／134

艰难的使命／139

柳暗花明／144

蒂马卡特总统访华／149

利尼总理：“友谊是不能用金钱买到的”／151

友情难忘／154

出席瓦努阿图独立十周年庆典／156

小岛都有唐人街／160

第四章 同其他岛国和地区的交往

南太论坛风波起／165

塔希提的赤子情／169

同“鸟粪王国”瑙鲁领导人的会见／181

在风雨飘摇的图瓦卢做客／189

为中国和马绍尔群岛建交传递信息／193

末 章 桑榆回眸／196

Contents



序章 走上外交之路

闯入外交学院

古人云：“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宇宙万物，发展变化，新陈代谢，自然规律。看看自己，已是一个年近耄耋之年的老人了。我于1991年3月回国，年届60，当年5月即办理了离休手续，迄今已18年矣。抚今思昔，感慨万端。

回想当年，我这个出身于山东农民家庭，满身泥土气的孩子，出于对共产党抗日救国所产生的朴素感情，怀着诚挚的敬仰之念，以15之髫龄，于1946年初的那个风雪交加之日，走出了生育我的家乡——焦家桥。步行近百里，到了青城县去参加革命。从此，在革命大熔炉中，伴着解放战争和各项政治运动，从还不太谙熟人世的童年，逐步成长和成熟。但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像我这样一个农家子弟，后来竟然成了国家的外交官。然而，事物的发展，必然和偶然总是相辅相成的。现在回顾我这个成长过程，其中有些环节和我能够进入外交之门，也非无关联。我想至少有两点可言。

首先是政治上的进步。这方面，我在早年，还确实是个后进分子。主要问题是幼稚的头脑加孩子气。1946年底，在我的鉴定中就有一条：“政治思想开展慢。”至今记忆犹新。尽管在战争年代，受周围进步快的同志影响，也提出过入党申请，但是只开花不结果，领导的评语总是“政治上不成熟”，所以直到1953年在北京才接纳我入党。随着党的教育和政治学习，尤其是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深入学习，“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意志与信念，与日俱增，受挫而弥坚。这时，有领导才说我“政治上比较成熟了”。闻之，



真感受宠若惊呢。



解放战争时期的徐明远。

其次是文化。当我正处于幼年学龄阶段，我们那个贫苦的家乡，没有正规的学校，只能时断时续地念私塾。有一年，村里成立一所高小，我有幸踏入校门。但不到一年，因校长通日寇，学校也随之解散。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曾在出版总署和文化部工作。那里文人如云，人才荟萃。在那些大机关里，我一个20来岁的小小工作人员，看看周围的年轻人，个个至少是初中生，大都可以提笔书文，出口成章。相比之下，自己既无学历，又无文化基础。这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从而也激励了我发愤图强、刻苦学习的决心，我一定要补上这一课。

于是，就近上了机关业余学校。我

从未正规学过数学，不知代数几何为何物。因此，我只集中选修语文、历史和地理，重点学习语文，尤其古典文学。那时，我的信念是：“要有能力为党工作，就要刻苦学文化。”为实践这一信念，那年头，一年到头，每晚7点到10点，必在办公室学习或上课。基本上不过周末与假日。如此下来，苦学了三年，最后，由文化部等六部门联合举办的“六联业校”的郭校长正式通知我：你不需要再上业校了。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一位老领导，那就是当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发行事业管理局的王益副局长。那时，我为局长们当秘书，实际上就是收发文件。王益同志是出版界元老，又是一位热心助人的领导。他不时汇集我起草公文中使用的错别字，列出正误表格，有的还加注了拼音读法，对我进行指点，堪称是手把手地帮助我学习文化。王益同志这种热切关怀部下、诲人不倦的高尚美德，使我永志不忘。

就在那些年里，我取得的“政治上比较成熟了”的评价和机关业余学校



毕业的资格，为组织上选拔干部入外交学院准备了有利条件，并很幸运地得以顺利通过。而且在外交学院入学考试中，那道古今译题，恰好就是我在业校熟读并作过复述练习的《前赤壁赋》中的一段。以我在业校攻读古典文学的基础，解此试卷，可以说就应付自如了。我作为调干学生，在外交学院英



外交学院同班部分同学合影。后排左二为作者。

语专科学习3年，于1959年毕业，从此走上了外交之路。这是我人生中的一大转折。

两进瑞典

1960年和1971年，我两次被派往驻瑞典使馆工作。在那里先后工作了10余年，经历了3任大使。我的职衔由随员、三秘到二秘。在瑞典的外交生涯，是我从外交的ABC学起，锻炼外交官的基本功，并达到基本具备外交官必要素质的时期，为未来的外交生涯打下了较满意的基础。现试举几例。

首先学习礼仪。瑞典是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对外实行中立政策，国内经济发达，社会稳定，人民的文化素质较高。在那里工作，一接触其社会，就要涉及诸多礼仪问题。作为外交官，必须具备符合自己身份的言谈举止和仪表。使馆领导也很重视这方面的言传身教。记得1960年首次出



1960年初到瑞典在使馆楼前留影。

国，外交部发了900元的置装费。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比当时一个17级干部9个月的工资还要多。我从未见过那么多钱，总是节省着花。我买了一顶黑色呢子鸭舌帽，以为很时髦了。到使馆上班第一天，董越千大使在门厅见到我就说：“我们这里戴这种帽子不合适，你要去买顶礼帽。”过了两天，我还没来得及去买，在门厅又碰上大使了。这次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怎么还戴这顶帽子？我看你这顶礼帽是非买不成啊！”那时瑞典主流社会学英国绅士派头，着装是很讲究的。瑞典的夏日，虽不太热，最高

气温也达30℃。但天气再热，外交人员外出也要着西装。实在太热了，外出要把西装搭在左臂上，衬衣外必须系领带。天气一凉，必须换深颜色的服装和鞋袜。有一年，刚过国庆，我们陪大使夫妇外出散步。出了使馆大门，大使忽然发现其夫人穿了双浅色袜子，立即严厉地要其夫人回馆。领导如此重视仪表，对我有深刻的影响。

礼仪中对外活动的履约守时，也是外交官的必修课。瑞典人重守信、严守时的素质，不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且我从多年与他们的来往中，养成了严格履约和守时的习惯。我深深体会到，外交活动履约守时，是对别人的尊重，同时也赢得对方对自己的尊重。更重要的，那是外交官素质和身



份的亮相。在瑞典的冬天，时常应邀赴家宴。按其习惯，不可迟到，也不能早来。为不迟到，要提前出发，但到达过早，又不可提前进门。天气严寒，当地环保法规定停车不准开暖气，我们只好遛街消磨时间，待到约定的时间方可前去按其门铃。此外，行路、进出门要礼让，上下车、上下电梯及入座等场合要女士优先；公共场所说话要小声，不能影响别人……我这些习惯的养成，无不受使馆外交官和瑞典人民的影响。30年前，瑞典的一些公共场合，已经设有滚动式电梯。我乘梯要靠右边站的习惯，也是那时养成的，至今习以为常。

其次，是具备严守纪律的素养。使馆是祖国的耳目和喉舌。“外交无小事”、“特命全权大使授权有限”是外交官熟知的信条。凡国内外的对外工作，均定有严格的请示汇报制度。对外做完一项事，会过一次客或接过一次电话，都要向领导及时汇报，重要的要写出书面汇报。更不必说，凡涉双边关系或国际事务的重大问题，不论表态或交涉，必须逐级向使馆和国内有关部门请示和报告。如此，方可当好参谋。安全纪律方面，我两次在瑞典工作期间，都实行馆员外出登记和两人同行的制度。这一规定，在那两个阵营对立的冷战时期，尤其重要。每个同志无不自觉遵守。

作为中下级外交人员，接触的看起来像是些“小事”。但出了差错，也会涉及国家关系和使馆与国家的荣誉及尊严。外交活动发请帖，看似小事，但如不精心细致，把对方姓名打错，或张冠李戴，装错信封，对外不仅产生不良影响，还可能引起对方误会，甚至影响关系。也是那个年代，我驻外一使馆，因具体办事人员一时疏忽，把一张请柬上的国名看错，导致发生大使误入一未建交国使馆，出席该国大使招待会的事件。在我们使馆，有一位新参加工作的同志接了个值班电话。自知听得不够准确，但又爱面子，没有如实报告接电话过程，便按其不准确的理解记录下来。结果错生3处：把 Military Attach（武官）听为商务专员，Austria（奥地利）听成澳大利亚，时间由14日弄成4日。这给使馆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又事涉两家使馆，不得不由参赞出面给对方道歉和解释。此事，在我的纪律观念上，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再一点就是相互尊重，搞好团结，稳妥处理发生的问题。不论在国内和国外，没有上下之间、同志之间和部门之间的团结，是难以搞好工作的。我那时不是使馆的党委委员，但从每周的办公会议上可以观察到，党委委员们



是否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使馆领导核心的团结一致，对带领全馆这班人做好工作，至关重要。国外的工作环境与条件有其显著的特点：远离祖国和亲人，生活较单调，思想易于波动；工作、生活、娱乐大多数时间都在一起。天天年年，抬头不见低头见，每个人的优缺点及性格特点大曝光。改革开放前，一秘以下外交官和工作人员，都不能带家属。常年见不到家中亲人，只靠两地书去弥补情感。物质待遇更是清苦。“文革”开始，废除工资制，一律改为国外津贴，国内发原来工资。即：在国外食宿公费，分级别发津贴。那时，大使每月津贴 90 元人民币，折合当地外汇约 50 克朗，而一根黄瓜就 5 克朗。我这个二秘是每月 65 元人民币。正是在这样一种近乎集体生活的特殊环境中，同志们难免有些磕磕碰碰的小事发生，部门之间也会有不协调的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中相处，一同工作，要学会从大局着眼，不计小事。当时的秦力真大使，就经常要求我们对同志，尤其对下级，对工勤人员，一定要宽容。我那时年轻气盛，脾气又不好。遇到问题很容易急躁，言谈出格。大使总是用亲切的语言和浅显的道理批评我和开导我：“这是一个二秘该说的话吗？”“你二秘能看什么文件，拿多少津贴？人家是职员，比你低。人家能看什么文件，拿多少津贴？就得让着别人，宽容别人呀。”真乃苦口良药，迄今言犹在耳。

在使馆这种环境中，处理内部发生的各种问题，可是大有学问。我从旁观察，秦大使在处理有关问题时，总是十分慎重。着重正面教育和疏导，不激化矛盾。有一件事，他的处理办法，使我受益匪浅。为会客方便，使馆的会客厅常年摆放着中华牌香烟。有同志对有人“占公家便宜”之事非常气愤，于是，欲布置人员藏于客厅抓“小偷”。此事幸亏秦大使及时发现。他十分重视，立即找到组织此事的同志谈话。大使说，我们这些人被派国外工作，是带着国家的信任来的，自己也深觉荣耀。为了几支香烟，你抓了人家“小偷”，他将如何向家人交代？再说，都是年轻人，他来日还长着啊。大使说，其实，丢失香烟的事，解决也简单，你平时不在客厅放烟不就行了吗！那同志这才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天地宽。大使每每指出：“我们这里是驻在外国的使馆，不是在自己的国家。”我体会，这就是他处理这些问题的出发点。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外交官受伟大祖国的重托，是国家的代表，责任重大。为此，要时时处处以维护



1977年陪秦力真大使（左一）及其夫人李华文（左三）访问哥德堡。右二为哥德堡市长约翰松，右一为作者。

国家的利益和尊严为己任。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着，秦大使不时地告诫大家：“我们远离祖国，但不是断了线的风筝，而是时刻和祖国紧密相连的。”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不论作任何外交交涉，进行何种外交活动，都要以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及口径为准则，准确无误地贯彻执行。要使于四方，不辱使命。为了国家的利益和荣誉，外交官必须一身正气，具有高尚的气节和理想。

瑞典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物质丰富，教育发达，人民文化素质较高，做事认真，很讲究文明礼貌。这是其优长之处。自然，同任何国家一样，其也有社会弊端的一面。在上个世纪50和6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时期，在驻瑞典使馆工作的个别人，对祖国经济发展失去信心，只看到瑞典的富足和丰富的物质生活，经不住物质的诱惑，贪图享受，先后有两名人员出走。另有一名，在当时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中，被外国特务用金钱和女色策反攻破，走上背叛祖国的可耻道路。所以，我经历的历届大使，



在对馆员的民族气节和情操的教育方面，都特别地重视，时常通过各种机会，要求全体人员，时刻以祖国的利益和尊严为首要大事，要“出淤泥而不染”，更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身临乌干达战火

在瑞典工作10余年，融于那个特定的环境中，既学习又工作，工作中受锻炼。长期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在政治思想上、外交政策的掌握上、外交业务的熟悉上，以及如何当好领导等方面受到的熏陶，对未来为党和国家更多更好地工作，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我调到驻乌干达使馆任政务参赞期间，工作起来，尤其在遇到棘手的问题时，就可以有师可承和举一反三了。

在乌干达，最大的考验，是1985年和1986年当地的两次军事政变及由此引发的7个月的战乱。回想起来，有3点值得一提。

1. 协助大使做好战时形势调研。乌干达的两次军事政变，皆属突发事件。为做好这种突发事件的调研，我们及时研究出当时政局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随时捕捉其动向中的一些蛛丝马迹及其先兆，并利用平时积累的资料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初步看法，即认为，乌干达的北方旅极大可能会发动政变，要从各个方面密切注视和了解北方旅的动向。

一天上午，美国大使馆一秘赫尔利专程登门向我通报称：北方旅当日很可能打进首都坎帕拉。为及时取得第一手情况，需要实地进行观察，我便叫上正在使馆的新华社记者小俞驱车进城。我们刚绕过横卧在使馆和市区之间的科洛洛山，就听到城里传来的炮声，并望见市区上空飘荡着团团烟雾。我继续向前行驶了一段路，眼见由市区呼号着的人群和狂奔的汽车迎面而来。转眼之间，枪炮声由远而近，车外子弹呼啸，炮弹爆炸。眼前的混乱局面，使道路受阻，不可能继续前进。我便从飞驰而来的车流中，见缝插针，调头急转，飞速横穿。这时，骤雨般的机关枪和冲锋枪声逼近。抬头望去，是政变军北方旅的军车赶来了。那些军人无法无天，盲目扫射，眼看人群中有人中弹身亡。那一辆辆满载政变军的10轮大卡车，在混乱的车流和人群中，如入无人之境，横冲直撞，那些来不及躲闪的人被撞倒，碰上的汽车则被撞翻，有的起火。我为了实地看看北方旅政变的发展变化，便开车前往乌干达

政府总理阿里玛迪和乌军参谋长史密斯的官邸。在那里，只见北方旅的士兵不仅占领了他们的官邸，且正在洗劫财物。官邸院内，衣物满地，一片狼藉。如此局面，说明北方旅的政变，基本上已经得手。这时，战斗尚未结束，枪炮仍不停地发射，我们



作者访乌干达靠北方旅政变上台的奥凯罗总统。

就近到新华社暂避。约一小时后，枪炮声渐稀，马路上到处是被撞坏和燃烧的汽车，遇难群众的尸体横躺竖卧，地面上尽是扔掉的衣物，路上无一人，街面呈现着惊人的寂静。我为了及时把观察到的情况向大使和国内报告，便抓紧时间，驱车上路。左躲右闪，绕过那些障碍物，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使馆。向大使汇报后，又将其他同志目睹的实况进行了综合，把北方旅政变成功的电报在第一时间发到国内。半小时后，乌干达电台广播，北方旅宣布乌总统奥博特政权被推翻。

2. 战火中关照援外员工。当年，中国在乌干达的援外和合作项目有5个单位，员工120余人。分散在首都和第二大城市金贾及距首都150公里以外的奇奔巴地区。这些援外单位，使馆虽事先为他们作了应变和安全部署，但当战斗打响，所有通信中断，无法取得联系。援外人员情况不明，使馆责任在身，急需尽快知道他们的安危。尤其是，中国援乌医疗队和援乌奇奔巴农场，都处于乌干达东部的国际公路沿线，那条公路是乌通向出海口的唯一通道，因而，也是每次战乱中被推翻的政要和败军逃往国外的必经之路。那些败军凭借手中的枪，一路上杀人越货，随心所欲。这些复杂的情况，就更加重了使馆对援外人员安全的责任和忧虑。为及时取得联系，只有派人前往。